

歷史回顧訪談記錄

受訪者：瞿宛文教授 訪問者：何佩珊

我想很多中小企業他，這種外移，很多其實可以說是一種類似移民的狀態

瞿：很多中小企業如果規模很小，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八〇年代末期，所面臨的選擇是外移或者是很努力的在台灣升級，或者是關掉，我們看到各種選擇都有。我認得很多的人他們就把生意關起來了，他們有的人是跑了一陣子大陸，跑得累了之後而又不想去住那裡的話就把生意收起來了。譬如成衣業，少數在台灣升級成功的就是做少樣多量訂單，但是大部份就外移，先是東南亞，然後就大陸。很多中小企業的這種外移，其實可以說是一種類似移民的狀態，就是說因為他沒有辦法在台灣有一個相對應的運作的話，就我們就只能說他是一種移民，這部份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台灣本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像我上次去南非講學的時候，接觸到一些類似的台灣移民，真感覺到台灣人很有開拓的精神，是一個移民的社會。但是，你問的問題很有意義，重要的不是對於外移做任何道德的譴責，重要的是，留下來的台灣的整個社會、經濟會怎麼樣的發展。所以對外投資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種，依據他在台灣有沒有留下什麼樣的根基來分，若他在外面的投資跟台灣沒有一個有機的連繫的話，那他跟台灣的关系就很淺了，當然有些情況他們會把某些利潤帶回來做一些什麼樣的運作。不過主要看比較大型的企業，他們在台灣保留什麼樣的運作，然後他們在大陸進行什麼樣的運作，然後之間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也只有大企業能如此作。

新加坡是唯一的一個例子，是利用跨國企業來做為他們發展以及產業升級的主體。怎麼樣定義它是不是一個跨國企業？我們知道對於跨國企業的文獻上面有很多的討論，到底國界是不是會消失，跨國企業是不是會變成我們國界的街？但實際上，絕大部份的跨國企業，都有一個 home base，也就是說美國通用汽車，他還是以美國為他的 home base，NOKIA 還是以芬蘭為他的 home base，這個 home base 有很多的意義。同時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譬如也有人研究說跨國企業到很多地方去做投資，這個趨勢絕對在增加中，對於落後國家他們的投資目的地，他們的影響是什麼，這向來是很有爭議的。有人就研究跨國企業的研發在那裡做，結果發現絕大部份的研發還是在他的 home base 做，那比例可能到七、八成滿高的。所以我一直覺得新加坡是唯一的例外，能利用跨國企業來做為他們發展以及產業升級的主體，但那個是一個我唯一找到的例外。

在台灣做產業升級的時候，這些來台灣投資的跨國企業所做的，或者是不做調適直接退出，或者被迫在台灣做一些調適，但是，多半我們看到的是階段性的撤出，譬如說是六〇年代、七〇年代的這些跨國公司的電子廠做的是裝配，規模也很大，但是，到了八〇年代大部份都退出了，因為他們不一定願意在台灣進行產業升級，在台灣進行產業升級的主要是本國的企業，所以這個主體還是存在的。

重要的是說，你要讓這些做為台灣經濟主體的這些本地的企業，能夠有足夠

的空間進行全球性的發展

重要的是，要讓這些做為台灣經濟主體的本地企業，能夠有足夠的空間進行全球性的發展。因為這是個全球化的經濟，只要他們還是把台灣當成他們的 home base，然後把研發以及集團的企業中心擺在台灣，並且他們集團企業能夠很健康的發展，那我想這對台灣會應該會有好處。所以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就是說我們所能夠管的就是台灣的經濟是怎麼樣，一但這個企業完全外移，變成移民性的整個家族的外移，這就不是我們關切的部份了。我們關切的範圍裡面，我們關切是他外移但是他的 home base 要留在台灣，他會繼續留在這裡發揮作用。但是我們要有一個認識，我們要給這些企業全球運籌的空間，讓他們做這樣子的事情，那我們才會保有動力的企業，有競爭力的企業，我不曉得這是不是回答了你的問題。何：我覺得很有意思是說，因為像林百里他會說我去中國是進行產業升級，說他在台灣還是有在做研發，甚至他花更多的錢在研發上面，所以我常常在想我們過去在辯論大膽西進和戒急用忍的政策時，所謂戒急用忍這一派，他們是認為說資金跟產業外移中國這麼嚴重，會造成台灣產業的空洞化和資金的大失血，我不曉得您怎麼看待這種論調？其次，如果順這個脈絡下來，我在想所謂的綠色矽島，應該是還兼帶著人文和環保這方面的需求，是不是只有像您講的那樣子，就是把耗能的、高污染的生產製造部份外移，台灣變成研發基地，才有可能兼顧”綠色”的部份？

資金向來是一個被動的配合條件，你把它鎖在那裡是沒有什麼用的。

瞿：我們要了解在市場經濟裡，政策會決定環境與誘因，但企業是主要的行動者，是企業在做決定，說要生產多少做多少的投資，因此企業的競爭力與活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企業要倒閉，或是怎麼樣的呀，他沒有辦法維持一個很有效的組織，沒有辦法去進行有競爭力的生產活動，那有沒有資金也不是那麼重要了，就是說台灣這邊還是滿多資金的，但是對於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有資金有什麼用？

資金一向都只是配合條件，若企業有競爭力，有發展的希望，那他可以應用各方面的資金。聽說有些有發展力的台商企業，在大陸都可以借得到錢。所以我想他們只要本身條件不錯的話，在香港上市，或在國際上市，都是有條件的做到。資金向來是一個被動的配合條件，想把它鎖在台灣是不可能做到，同時也沒有什麼用的。想要不讓資金外流，其實是本末倒置。

想把資金鎖在國內是一種非常不合道理的思考方式。企業是行動者，你要讓企業有競爭力，這是關鍵點，然後政府要確保他們在資金需求上，管道能夠很通暢，政府要管的是這些，而不能去管說這個資金要鎖在國內，這是非常落伍的方式，而且非常的 counter productive。另一方面，當然現在台灣資金上的問題是在傳統產業，像在股市上，傳統產業成了水餃股、雞蛋股等，傳統產業現已不能靠股市來籌措他們的資金了，而銀行也不很願意借貸給它們，這是個問題。

我想很多傳業產業可能需要政府做一些不同的產業政策方面的作法，因為我們過去比較習慣做一些推動新興產業的這種作法

同時現在銀行有這麼大的呆帳問題，所以我想其實你要擔心資金的話，更應該管的是國內的問題，傳統產業在台灣，有很好的基礎，紡織業曾經領導台灣的經濟這麼久，也還是有很好的基礎，我們還是希望紡織業能夠有一些比較積極的作法。

我相信這是有希望的，很多傳統產業可能需要政府做一些不同的產業政策的作法。我們過去比較習慣做一些推動新興產業的作法，就是我們的產業政策（我等一下再談一下整個的架構），主要是用來推動新興產業，但我們現在的新問題是怎麼樣來重整傳統產業，這相當迫切。但是，我們這個現有的制度裡面比較不習慣做這個，我們習慣成長，對於新興的產業比較好做。

日本的通產省，因為他們碰到比較多波的經濟景氣循環，他們也有比較成熟的經濟，他們有一套關於怎麼樣幫助夕陽工業去重整的一些做法，我覺得這個我們可以參考。現在大家也都體會到高科技產業、資訊產業在我們經濟中的比例中佔得太大了，我們必需要多角化一點，對我們的經濟穩定、多方面的成長都有好處，更何況我們的傳統產業本來就有一些基礎是可行的，只是沒有很好的作法，所以我想那個方面其實是可以做的。

何：那日本這幾年來的經濟不景氣，也已經十年之久了

瞿：他們這個拯救夕陽產業是幾十年了，就是說譬如他們剛開始的產業，石化產業很早就好像被列為夕陽產業了，他們就會說這個已經成熟了，然後就會幫助他們做一些協調，一些還有競爭力的廠商就協力出錢把比較沒有競爭力的廠商買掉，讓他們退出去等等這樣子的作法。

如果能夠像美國解決他們 Savings & Loans 的金融危機，比較快解決的話，我想日本的問題可以早一點解決

我講的是一個比較一般性的問題，日本這十年來的問題，其實說近一點的話，是他們的金融危機沒有好好處理，一直不處理，這是他們整個結構上太多僵硬的地方。看看他的政治制度也那麼奇怪，就可以理解他們有太多的僵硬性，他們過去的制度、過去的產業組織，幫助他們在比較成熟的重要工業中（如消費電子這些產業）有很好的成績，但是，到了九〇年代，他們必須要做很多的調整，他們就沒有辦法做。我想他們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問題，譬如說他們政府在政治上好像沒有什麼領導的能力去解決，很快的解決他們金融危機的問題。他們的呆帳問題很嚴重，如果日本政府能夠像美國解決他們 S&L 的金融危機，比較明快解決的話，我想日本的問題可以早一點解決，但到現在他就是處在一個好像不能動的一種狀態，是滿特別的。

我想當然也有人說台灣現在的金融危機是不是有點類似這個樣子，我們沒有日本的這個條件可以拖十年，但是顯然市場經濟都是不定期的、會不斷出現這種金融的危機。

隨著景氣循環的變化，常常整個金融市場的信用擴張會過度擴張，然後他必須要調整，若沒那麼嚴重就是“軟著陸”，有一些銀行可以被重整、或破產或是怎麼樣，那你就重新來過嘛！

離開台灣，稱讚台灣產業政策的人比較多，在台灣的話，反而稱讚台灣產業政策的人比較少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當嚴重，那個時候台灣其實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不過舊政府就把它掩蓋起來，不斷的進行紓困，結果到現在我們就剩下了一個很不健康的銀行體系。我們銀行本來數目就太多，又逼迫銀行紓困，不斷紓困之下就會有太多的呆帳。不過要處理也不是那麼困難，只要參考一下其他國家怎麼樣去處理金融危機。解決的方法不出那幾種，但是問題就是你要有一些政治的魄力，先去面對問題，然後去把它做到。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回到說，舊政府和新政府之間，他們所面對的時空、環境已經有些很大的差距，但是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依舊。

一般來說我想離開台灣，稱讚台灣產業政策的人比較多，在台灣的話反而稱讚台灣產業政策的人比較少，就是國外的學者都非常稱讚台灣。台灣的經濟成長，台灣的產業政策，我想舊政府成績最好的就是這一部份嘛！

經濟發展越落後的國家，所需要的政府干預就越大。我們看看台灣整個發展過程，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就是依賴產業政策的干預。五 0 年代的紡織業，紡織業從代紡代織開始是非常強的干預，然後一步一步的，六 0 年代從進口替代轉到出口導向，然後加工出口區的出口產業，同時產業政策也不忘一直要推動產業升級，所以六 0 年代推動石化業，那是以國營企業的方式來做。

我們實在沒有什麼條件去忽視產業政策的角色跟它的重要性

到了七 0 年代，推動鋼鐵業，也是以國營企業的方式來做。到了八 0 年代推動電子業，就開始以工研院衍生公司來替代國營企業的角色。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這些關鍵性產業來看，政府的產業政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們也會發現我們實在沒有什麼條件去忽視這個台灣的產業政策。譬如說，我們晶圓代工的兩大龍頭，台積電和聯華電子都是工研院的衍生公司，時間也很近，一個是 1981 年，一個是 1987 年。同時台積電在成立的時候，很多企業在政府叫他們入股的時候，都很不情願，這些故事都很有名，想想這也不過是十二年前的事情。現在沒有任何人會否定台積電跟聯電是台灣電子業的兩大支柱，可見產業政策的重要性。雖然說我也同意說，隨著發展程度的提高，產業政策直接干預的程度會降低，但想想即使十二年前，台灣現在的模範企業 台積電也只不過是十二年前以工研院衍生方式成立的。我想在各種方面，這個例子其實是蠻有力的。現在大部份的經濟學家都會說我們要自由經濟，政府干預越少越好的話，但是，我們其實沒有這個本錢，台灣其實還是一個後進的國家，同時只要想想這個例子，就會瞭解我們基礎的淺薄。萬一當初沒有推行這樣的產業政策，那我們現在也就很可能沒有晶圓代工這產業，因為在政府推台積電的時候，那個時候的企業界的公認就是說，IC 這個產業太花錢了。

我們知道南韓的情況和台灣不太一樣，三星與現代電子他們有國家的全力支持，並且他們也都是全力的要拼最大，他們也是好不容易拼了一個地位，但也不是那麼穩固，好像現代電子正在要賣好幾個晶圓廠嘛！我們可以了解到東亞這些

國家，基礎還不是那麼的穩固，尤其是這些資訊產業、高科技產業，又競爭那麼的激烈，變化這麼的快速，所以我想我們沒有條件可以忽視產業政策。很多經濟學家就喜歡說自由市場呀，干預越少越好呀，我覺得講道理，還不如舉這兩個例子最有力，就是說萬一現在沒有這兩家廠的話，我們怎麼辦？

產業政策並不是指政府單單一個決定，或者是一個想法而已，而是整個制度。譬如說現在我們已經建立起來，已經運作了幾十年的推動產業發展的整個制度與組織，是以經濟部為中心，上面有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下面有工業局、國貿局等，配合旁邊一些如國科會的單位，以及一大堆經濟部管轄下的財團法人，如工研院這些研發單位，一起推動產業政策，有這樣子的一個體系，然後有各種很細微、細節的規章制度，我們要看到的是整個的制度，以及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跟他們的配合。我們剛剛已經講過，舊政府裡面運作的最好的就是這一塊，就是推動新興產業的產業政策制度裏的整個官僚體系。

新政府對這樣子的一個體系，第一個態度就是要很尊重他

所以我覺得新政府對這個體系，第一個態度就是要很尊重他，因為這個制度跟台灣經濟能夠發展到今天是息息相關的，如果說台灣以經濟立國，這是我們的經濟基礎，不管兩岸政治關係怎麼樣，經濟是我們立國的基礎，如果台灣經濟很差的話，其他都真的免談，對於過去很有成績的經濟官僚體系，推動產業政策的整個制度體系，基本上我們要尊重，當然我過去也一直對於這個舊政府的體系做過很多的批評，我覺得他還需要做一些調整。

譬如在環保等各種方面，我也曾講了很多，但是我現在感覺到自己批評角度好像要調整。過去我對舊政府的各種目標、價值調整，不留餘地有不少批評，不過，我認為新政府上台後，第一個，必須要對於推動產業政策的整個官僚體系有一個基本的尊重，你先要維持它，然後你再做一些調整，不然的話，我想會對於台灣產業的發展會產生很不好的影響，這策劃執行產業政策的制度，以往有相當自主的空間，而維持這空間是極為重要的。我們應該要去瞭解過去的發展方式，瞭解產業政策相對的自主性。譬如說 1987 年左右，張忠謀在當工研院院長，他提出了晶圓代工的這樣一個概念，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是過程很曲折、很複雜，但是他有這個空間去提出這個概念，並得到了支持。

我們在外面的人都是外行人，我們不會知道那個時候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我想張忠謀的貢獻就是在於說，他累積了那麼多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在那個時候提出這樣的想法，重要的不是他的一個想法，而是說在那樣的制度裡面，他有那個位置去提出這個想法，同時在這個制度裡面他得到了支持，讓他去將它執行做出來，因而我們今天可以看到這個成果。就是說我們要儘量避免政治化，給他一些相對的自主性。

我們再往後看，譬如說我們現在講李國鼎、孫運璿在七 0 年代，推動這些像科學園區、工研院、國科會、科技顧問室等，整個制度是慢慢建構起來的，有些部份是比較失敗，有些部份比較成功。我們看到的今天的成果，我們都可以追溯到，在過去某個時刻，有人在這個制度裡面提出了一個想法，譬如說像科學園區、

或者像工研院，或者是說那個時候去電子所先推 RCA，這個 IC 的計劃等等，那當然這些是比較成功的例子，然後我們看到了成果。比較重要的是，在這個制度裡面，有人在那時候提出了一個好的想法，制度有空間給予支持，然後也做到了，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我到處都會碰到有人問我說未來新興工業會是哪些？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什麼？我一直都告訴大家，我們外行人不要去幫他們內行人去找確切的答案，重要的是你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制度，容許他們在裡面的專業人士可以有空間提出答案，就像張忠謀在那個時候，他會想出這樣的一個晶圓代工的方案，而我們都是在外面的外行人，我們要尊重專業，我們不可能想到說要作晶圓代工或是做其他是不是？

對於這樣建立起來的一個制度，在外面的人常常會利用政治的力量對它有些不太尊重的態度，這是在壓縮它的自主性空間，這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像我這樣子一個研究學者，我不覺得我的角色要去找一個 real solution，就是下一步你要怎麼做，我認為外面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可以說，要給這樣的制度一個什麼樣的位置，要給他怎麼樣的支持，讓在這個制度裡面的人有空間去做這樣子的事。我想現在的危險，就是對於這樣建立起來的一個制度，在外面的人常常會利用政治的力量對它有些不太尊重的態度，這是在壓縮這制度的自主性空間，這是比較危險的。

對於經濟發展跟環保，以及其它任務目標的折衝，必須是一個比較漸進的過程，要比較考慮好各種情況之後才能做出來。經濟發展是很實際的事情，環保這種事情必需一步一步來，配合著經濟活動一步一步來，也需要很多的大眾教育工作來配合，看來急不得，這過程必然是一個折衝。

政府現在有各式各樣的機制去推動產業政策，不需要政治人物去說我們應該發展什麼產業，因為這個制度裡面，會自己去產生這樣子的結果。譬如制度中會有產官學委員會，會去討論十大新興產業是哪些，科技專案怎麼樣子去篩選，這機制大致上到目前為止，運作的還不錯，它越不政治化，結果會越好。

做為一個研究產業政策的學者，我會比較強調的是這些機制，台灣太流行外行人要給解決方案，這不是很適合。我覺得只要這個制度運行的很合理的話，那他應該就會協助台灣，創造出下一波的新興產業，如果他不能做到的話，那當然就是這個制度就是有問題，到目前為止這個制度的結果都還不錯。

我想以後的產業政策對於研發，對於新興產業的補貼，這些是不可避免的何：經濟官僚體系其實是一個還蠻完整的機制？

瞿：對，我想是的，運行的好的東西，你就不要把它搞壞了嘛。新政府可以也必須做一些調整，但要維護這套產業政策制度的完整性與自主性。當然，我一直說有些地方要做調整，舊政府有些僵固性，例如近幾年來的戒急用忍政策，就給了很多大型企業玩中國牌的空間，從六輕開始，這些大的投資計畫，只要超過二億的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補貼條件，包括水、電、港口等方面。對成熟產業的這些補貼是無助於產業升級的。

以後的產業政策對於研發，對於新興產業的補貼，仍是不可避免的。全世界包括美國都在做，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必要去取消這些作法，我們就是要去扶植新興產業，如此後進國家才有追趕上先進國的可能。現在要做的調整的部份是，對於成熟產業不牽涉產業升級的擴張，實不應再去提供補貼，要做的調整主要是這方面。很多經濟學者主張對產業千篇一律都不該干預，我並不贊同這樣的說法，我們後進國家對於新興產業、對於研發活動，政策上應該繼續提供補貼。

何：在這一波新的經濟情勢變動下，您覺得說比如知識經濟，後 PC，資訊工業時代，政府在制度的環境與設計上，是不是還可以再多做些事情？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政府能做的好像越來越少了，但是我們剛剛又提到這個產業政策，好像政府在 base 上要提供更多，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孫運璿他們有整個計劃，這樣做下來？我的意思是說新政府在這個基礎工程上，它可以做些什麼？不知道老師，你是不是有想到這個問題？

其實在全球化的環境裡面，政府的角色是越來越重要了

瞿：我是不贊成說政府能夠做的越來越少，我覺得其實相反。我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角色其實越來越重要，我不是說政府能夠做的是要去作更多的直接干預，像是去設台積電或中鋼公司，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可以看到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經濟變遷的步調也越來越快。譬如各國都會去爭取跨國企業來投資，來設研發中心，這方面就變成了一個國際間的競爭，大家在筆的是國家競爭環境，而政府能力與政策品質是這環境中的關鍵因素。當然如何避免這國際競爭惡質化是一難題。

不過，要吸引外資以及讓本國的企業留下來，並不是靠給一些的優惠就可以解決，能夠這麼簡單，所有的國家都做，那效用就互相抵消了。這種國際間的競爭是多層面的，比如說有人曾有這樣子的說法，我覺得很有趣，就是說若大家市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那可能會在一些越不是市場化的因素上面競爭，譬如在人力資源、都市生活條件等。譬如說，新加坡在所有的投資環境的調查裡，都會被列為是最先進的經商環境，他所有的軟體、硬體，各種配合的條件，都相當先進。

如果你去追究看看新加坡的環境，看看那些軟、硬體以及各種的配合條件，就會發現那些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所以，在全球化的環境裡面，政府的角色是越來越重要了。

新加坡政府當然不只是做軟、硬體設施，他產業政策的積極程度也是一個在國際間名列前茅的。譬如，他是唯一用外資企業來推動他的產業升級的例子，他也是少數對於外資跨國企業的研發也給補貼的國家，因為大部份國家像台灣，補貼研發也都是針對本國企業。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很主動去推動產業升級，像八十年代他要淘汰掉勞力密集的產業，就幾乎把他推出去了。

新加坡政府不像現在台灣，會怨嘆資本外移會讓就業機會外移，他覺得說如果各種條件、工資、市場條件差不多了，就應該要從勞力密集產業裡面退出來了，甚至主動退出。然後他就積極的去找一些適合的外資企業，邀請它們來設廠。以他那樣一個彈丸之地，資訊業的產值一向是跟台灣差不多，2000 年台灣的產值

是世界第三，新加坡是第四，產值差不多，對於一個三百萬人的國家，當然是很不得了的成績。

當然別的國家不見得有這個條件、能力，去做這件事情，新加坡社會也付出了一些不民主的代價。但是我主要是要以新加坡做一個例子，來顯示說在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一個全球化的環境，小國要快速升級，要協助本身產業的變化，要推動下一波的新興產業，那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實是非常多。新加坡可以做為我們課堂上研究的一個範例，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做到，同時也不見得一定要做到那個樣子，但是回答你的問題就是說，我想其實政府的角色是越來越重要。

我們曉得美國政府在國外，不斷的以他的政治力量來幫助他的各種企業，得到各種好處，實際上很多美國的學者也在說那個是一種最壞的產業政策

何：所以應該大家都以為會消滅政府，但其實好像又不是這樣的。

瞿：對，我想大家對於政府會期待好像管得越少越好，但是有很多事情政府非去管理或給予規範不可。有一些是需要比較積極主動處理的、具前膽性的事務，還有一些是被動性的，比如說像飛行安全與藥品管理等。就是說政府的角色其實各種各樣，在產業政策方面，簡單的說，其實我們沒有不積極的餘裕。

我們不可能以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作為例子，以他產業政策很不積極來做為我們的典範嘛，因為他是一個先進國家，一個領導國，他的先進企業在全球居領導地位。更何況我們曉得美國政府在國外，不斷的以他的政治力量來幫助他的各種企業，得到各種好處。實際上很多美國的學者曾說那是種最壞的產業政策，幫助那些不該幫助的企業，來國外欺壓其他落後國家，幫助這些企業，維持他們不先進的狀態。

所以美國不是我們的範例，新加坡雖不完全是我們的範例，但是可以做為一個參考。簡單地來說，台灣經濟基礎不能說很薄弱，但也不很深厚，更何況我們是代工者，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其實不是很穩固。因此，台灣必須不斷的轉變，必須變換的壓力很大，並且必須變換的很快，因此用國家的政策配合也變得很重要。所以在這個意義下，台灣的產業政策繼續的還是會很重要，只是大家原以為政府的角色就必然是一個干預性很高的角色，其實重要的是干預的對、做得對，那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當然，你也可以不干預呀，那很多積極推動的東西就沒有人做。

最起碼政府可以扮演協調的角色，像很多產業比較成熟，有一些特定的問題，雖不必天天去管他，但是可以做一些協調，來協助成熟產業調整的過程。再則，經濟轉型以來，很多規章制度已經落伍，因為台灣變化太快，過去舊政府常便宜行事，規章制度的修改都多所拖延。

何：不過講到立法院，所以我想因為隨著全球化的來臨，政府越來越重要，可是代議政治的問題在台灣惡果已經出來了，亞洲式的這種民主，對於這種亞洲的代工經濟，他們之間有沒有互相衝突？它到底是正面的呢？還是反過來是傷害的？不知道您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這樣子。

全亞洲國家的代議政治都出了問題，像日本在倒閣，然後菲律賓要被彈劾，

菲律賓其實是一個最慘的例子，他在六0年代興盛過，後來他搞了民主政治之後，反而就整個一路下降，我覺得這是有點有趣的問題

瞿：對，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過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問題。有些人反對東亞式發展型國家的作用，也因此懷疑東亞式的經濟發展都仰賴威權國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有些人則認為東亞代議政治運行失敗，還不如以前的威權統治。

千萬不要走回頭路，認為威權統治比較好。現在政治紊亂，是因為過去大家只學會如何反抗威權體制，並沒有真正的學到如何互相相處、如何建立民主體制、過民主生活，選舉不等於民主，在建立民主體制上，我們才起步而已，同時這些建立健全制度的工作費時費力，不容易有速效，很容易讓人失去信心。另一方面，自主性推動產業政策的經濟官僚體系，並不一定需要威權體制的支持才能存在，但需要社會共識以及政治上的支持以給他空間。

何：可是居然台灣的人，為什麼比較渴望移民到中國？

對於經濟政策，要給他一個比較自由性的空間，就是不要用很政治化的做法來給他干預

瞿：對呀，最近天下雜誌的調查把大家都嚇一跳，我覺得其實它是在顯示出一個氣氛上的變化。在氣勢上，中國在過去這十年來，經濟有很大的進步，在很多方面比起以前也開放了不少，變化神速的上海更是魅力日增。所以我想那個數字也顯示了這些，在十多年前的話，在台灣人還覺得自己有錢，看不起大陸人很得意，同時台商投資可以是一個籌碼，可以去跟大陸談判。

但是到了今天兩岸氣勢消長之下，對於大陸現在大家也開始感覺到沒有什麼籌碼了，台商的投資也不是奇貨可居了，所以其實已有這樣的心理變化在產生。變化實在很快，才十多年前，兩岸尚無太多來往，我們完全都在看美國，用日本原料來出口到美國，現在我們出口到大陸跟出口到美國差不多了。同時投資方向整個經濟關係的緊密，在過去這十年是有增無減，並且變化的速度這麼的快，所以我想在這些調查中心態上都會顯現出來。這些經濟關係已經相當的緊密，你不能去否認這件東西，但是比較可以談的就是說，還是老話，就是對於這個經濟政策，要給他一個比較自由性的空間，就是不要用很政治化的做法來給他干預，當然現在，如果要以這樣子的經濟政策來談的話，這個是一個不好的發展，越來越短線，越來越政治化的干預，那我想這個對於經濟政策的運作來講都比較不好的。

在你旁邊，跟你有緊密關係的大型經濟體，為了自己的利益，都要跟他保持一個和平的關係

何：民進黨執政其實很難像國民黨的執政時期，一規劃就是十幾、二十年那這樣子的長線操作，所以我覺得是有危機，這是一個代議政治的曲線，那我想台灣到底這條路走的對不對，這好像你不能說對不對，可是台灣就是那麼樣的一個奇怪的地方，他的人民，我們的人民對經濟發展的渴望，好像只要有錢賺就往那裡都可以去這樣子。

瞿：對於大部份的人，我想除了基本教義派之外，對於大部份人而言經濟還是最重要的。並且，台灣經濟規模小，以前是完全依附在美國與日本下面，但現在有

一個上升中的中國大陸。所有的人都會承認中國會是未來亞洲及世界上的一個大國，並且台灣已經在經濟上跟大陸有了緊密的關係，大家不能夠假裝說這個關係不存在，重要的是台灣這十多年來在這個經濟關係中得到了好處，因此為了自身的利益，保持一個和平的關係是個最起碼的要求，從任何利益的考慮，都是應該要這麼想，更何況在同文同種的優勢下，大陸市場提供了台灣企業唯一的脫離只為歐美日廠商作代工的可能性。進一步說，只要中國大陸的經濟會繼續成長，台灣的經濟前途就會與其更為整合，比較負責任的作法會是正面積極的面對，而不是躲避與拖延。

歷史回顧訪談記錄，何佩珊訪問瞿宛文，《綠色矽島》紀錄片計畫，2001年，未發表。後收錄於《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